

为人孤傲 为文恬淡



《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
孙犁
中华书局

孙犁喜欢读书,也喜欢写读书感想,但写得最多、最为动情的,还是读史笔记。在他的读史笔记中,写得最感人的又是读人物传记后写的笔记。由此,对于怎么写历史和怎么写传记,他都有很多自己的见解。比如:“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读〈燕丹子〉》)又说:“文学家不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

实。”(《与友人论传记》)还说:“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见识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个为万世表、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三国志诸葛亮传》)孙犁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常是联系人生境遇,发别人未发

之高论,深刻而动人。

孙犁在《读旧唐书》中的《陈子昂 宋之问》篇文末,有议论曰:

汉高祖听任吕后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后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后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

孙犁觉得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包容的,这个观点他在很多地方都曾经谈及过。比如在《辽居稿》中,说罗振玉当时在辽东忠心于溥仪,往来日本,为建立一个傀儡小朝廷而奔走,而后评论说:

人之一生,行为主,文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伪;言行不一,其人必伪。文章著作,都要经过历史的判定与淘汰。

但行文到最后,孙犁还是说:当然,学术也要与政治有所分列。罗振玉写的金石跋尾,后世一些专家学者,还是要参考的。

孙犁是一位真实的作家,他读史书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宽容,在他自己评定别人的时候,也是非常宽容的。孙犁也是一位敏感的作家,其晚年偏好阅读史部的传记,是有原因的:“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然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泾河。这是很有道理的。”(《清代文献二》)孙犁

的气质决定了他阅读的选择,他就是一位比较凝重的人,所以尽管读史使人沉重,但他还是选择了读史,他说:

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这一转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阅读孙犁的读史笔记,我们发现,孙犁宽容的历史观和现实中人们说的所谓的自私冷漠形成强烈对比。这是一位内心善良而又无比冷静的作家。

这本《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收录的主要是孙犁阅读史部书的文字,这些文章有读书笔记、题记,还有书衣文字。四库全书中的史部有十五大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此书大致按照正史、纪事本末、诏令奏议、传记、政书和目录等这一顺序编排。书的附录部分,还收录了和史部书相关的议论文字,对于更好理解作者读史书的心得有所裨益。

孙犁的文字,尤其是读书札记、书衣上的文字,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书衣上写道:“昨晚台上坐,闻树上鸟声甚美。起而觅之,仰望甚久。引来儿童,遂踊跃以弹弓射之。鸟不知远引,中二弹落地,伤头及腹。乃一虎皮鸚哥,甚可惋惜。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只嫌笼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弹弓。鸟以声亡,虽不死我手,亦甚不怡。”随笔遣兴,性情随见,醇如美酒,历久弥香,越发让人爱不释手。至于编选这样一部孙犁读史的文集来呈现孙犁宽容的历史观,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孙犁其为人之孤傲和为文之恬淡了。(来源:文汇报)



《黑暗中的星光》
作者:安吉·托马索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小说以黑人少女思坦尔的口吻成功地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深入探索了两个世界的碰撞与冲突,创造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奇迹。



《看万物》
作者:伊莎贝尔·米尼奥斯·马丁斯
贝尔纳多·P·卡瓦略
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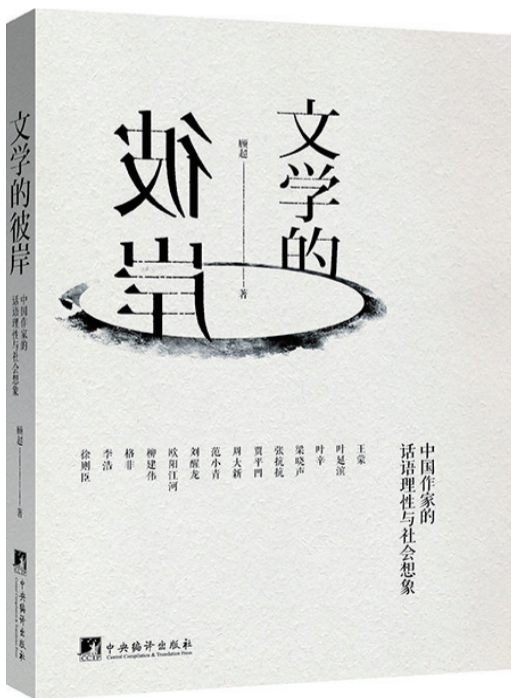
本书探索365天包罗万象的自然变化,涵盖100条探索世界的观察指南。用迷人诗意的方式讲述植物、地理、天文知识。欧洲著名插画家贝尔纳多为本书创作了线条简洁、充满艺术性的插图,并将大自然的照片特殊处理,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手绘和照片合成,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



《人五人六》
作者:张发财
出版社:岳麓书社

《人五人六》是张发财以历史人物为主题的文章集结。脱下轻松搞笑的外衣,作者的历史文章却是“言必有据”的严谨作品,每一篇文章皆有所本、皆有出处。张发财在阅读大量历史文献、经过严格考证之后,用“不正经”的风趣笔调,把数十万字的史料转换成两三千字的文章呈献给读者。

建构文学的公共空间



《文学的彼岸》
顾超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本雅明曾经宣称自己的理想是用镶嵌缀合的方式创作一部完全由引文构成的著作,顾超的《文学的彼岸》用访谈拼贴结撰成了一部著作。两者一方面年代相隔,另一方面主旨不同,他们可能共同有着超越于“文学”本体的潜在欲望。在顾超的表述中,就是发掘“哲学化的文学”,其目的是“通过作家们的话语凝练出文学公共领域的社会想象”,正如其副标题所显示的“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

社会想象”。
通过王蒙、叶延滨、叶辛、梁晓声、张抗抗、贾平凹、周大新、范小青、刘醒龙、欧阳江河、柳建伟、格非、李浩、徐则臣等14位作家的单独访谈、共同问题的回答,《文学的彼岸》形成了一种复调式结构,让不同教育背景、年龄层、职业经历和居住地方的作家各言其志、平行对话。
事实上,关于文学访谈类的书比比皆是,前有著名的《巴黎访谈》,后

有形形形色色的以年代划分的作家访谈录,这些书尽管提问者有着明确的问题预设,但往往以访谈对象为主体,随言赋形,存史留真。顾超的访谈则有着鲜明的主题性线索,这个线索就是从宏观与概括的角度,提取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包括文学的审美与技巧,更多在于文学的认知与教育功能,如何通过重塑价值与共识,来建构文学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进而达到文学的善治。就此而言,其关怀不可谓不大,其立意不可谓不高。

如果我们不是将政治狭隘地理解为具体的某种社会管理运作,而视为身处社会中的具有历史性的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同时我们不是将文学片面地理解为现代以来的分科惯性界定,而视作人们抒情言志、表意叙事的基本符号行为,那么我们必得承认文学与社会从来都不能分割开来。顾超《文学的彼岸》正是要立足于当代的现场,通过让关于文学的不同见解众声喧哗,来探索我们时代文学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置身改革时代,精神生活中的沦陷成为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如何走出资本逻辑和商业伦理的桎梏,在物质、生理与本能的自然人生活中,重塑社会人的尊严、生活意义、永恒性等价值与目的显得尤为重要。

“世界是平的”,文学的功能又在于保持各不相同的事物之间的差异并力图使其彼此对话和沟通。

世界在混乱中充满生机,困难中孕育创造。就像王蒙所说:“如果不能在这种纠结中找到整合与平衡乃至融合的道路,就会陷入危殆”。这个时候不能就文学谈文学,必须将其放置在悠久的历史传统与

开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进行定位。所以顾超的意图在于谋求多样性与一体性相调和的途径,以弥合分裂,当然这种共识的基础一定是建基于尊重个体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之上的。因而顾超提到的交往理性和协商共识不失为一条中正平和的道路。

顾超将作家视为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致力于从整体的角度思索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梁晓声看来,化解当下社会的各种问题与焦虑,需要知识分子同人民大众“在底线上求同存异,以图社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进步”,知识分子只能助力于缓慢微小的进步。即文学要回到它起始时期就具备的理想主义:不仅要表现人在生活中是怎样的,更要表现人应该是怎样的,不仅应该是合于道德的,更应该是出于道德的。这样它就不仅仅是镜,还是灯,不仅仅反映,同时还要照亮;不仅是反映实存,而且要召唤理想。这个理想在于,严肃文学并不会消亡,而是会继续坚强地存在。

应该说,本书让不同的声音、观点与态度自行呈现,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但受访者的范围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多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知名作家,而新兴的网络作家和无数底层写作者尚处于缺席的位置,而他们也构成了我们时代文学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能是带来文学新变的因子。期待着顾超能接续本书的思路,扩展范围,再做续篇。相信能够别开生面,正如他引用阿伦特的话所说:“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发现和开辟自己的道路”。(来源:光明网)